

国 学 初 阶

國學文選類纂

钱基博 著 傅宏星 编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 学 初 阶

国学文选类纂

钱基博 著 傅宏星 编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文选类纂 / 钱基博著;傅宏星编校.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9

(国学初阶)

ISBN 978-7-5617-8089-3

I. ①国… II. ①钱…②傅… III. ①国学-文集

IV. ①Z1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4325号

国学初阶

国学文选类纂

著 者 钱基博

点 校 者 傅宏星

特约编辑 黄曙辉

策划编辑 王 焰

项目编辑 方学毅

装帧设计 劳 韧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杭州富阳永昌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32开

印 张 7.37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0月第1次

印 数 3000

书 号 ISBN 978-7-5617-8089-3/I·714

定 价 24.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出版缘起

钱基博先生(1887—1957),字子泉,号潜庐、老泉,江苏无锡人。现代著名古文大家、文史专家和教育家。历任私立上海圣约翰大学、国立北京清华大学、私立上海光华大学、国立南京第四中山大学、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国立浙江大学、湖南国立师范学院、私立武昌华中大学等高校国文系教授,或兼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全国解放后则继任华中师范学院(即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寿终。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不仅长期执教国内各著名学府,杏坛耕耘,桃李满天下,而且博通四部之学,著作等身。他的国学思想更是博大精深,自成体系,远非浅见寡闻如我者所能窥其一二也。如何全面理解钱先生的国学思想体系,目前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和积极参与;只有王丽明、汤红兵二位学友做过一些初步的探讨^①,心得颇多。比如汤红兵先生就曾将钱先生的国学分类思想概括为三个层次,分别为“以民族性解国学”、“以六类分国学”、“以义数之辨(对应人文主义与古典主义)析国学”;明辨卓识,的确高出一一般谈士。不过,由于资料掌握不够完备,他似乎遗漏了“以七期断国学之代殊”这一分类层次。通过这四个层次,或许能够深入理解钱先生的国学思想体系,同时为初学者提供一把打开“钱学”之门的钥匙。可惜这里不便展开深论,我只能补

^① 参见王丽明《读〈国学文选类纂·总叙〉》、汤红兵《试论钱基博的国学分类思想》二文,均刊于《钱基博学术研究》(王玉德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一书。

充一点粗浅的认识，以作引玉之砖。

众所周知，自晚清“国学”一词流行以来，给国学所下的定义，为数不少，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更是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其实，比较异同，在剔除了各类“兴到乱语”、似是而非的宏论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争论双方往往都忽略了“国学”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范畴。而妄图生搬硬套西洋分科系统来切割国学者，往往削足适履，两败俱伤，无疑也是一种极端不明智的做法。面对历次“国学运动”和“国学热”所形成的新旧传统，以及由此引发的混乱局面，要求今天的学者一下子讲清楚“什么是国学”，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事情。李学勤先生因此建议，大家可以通过学术史的角度来认识国学，并举例说：“经常有朋友、同学问我，要了解国学，初识门径，应该从哪些书入手，我总是推荐两本书，一本是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一本便是上面提到过的钱穆《国学概论》。章书从小学谈到经、史、子、集，是横的分类介绍，钱书自孔子下及民国，是纵的历史叙述。两书体例不同，但和其他类似著作一样，贯穿着作者本人的见解。”^①其真实目的是要提醒我们：学习国学知识时，不仅要注意“国学”横的分类介绍，而且还要清楚“国学”纵的历史叙述。

作为钱基博先生生平最重要的国学著作之一，他编撰的这部《国学文选类纂》，正是兼顾了“国学”横的分类介绍和纵的历史叙述，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国学启蒙读物。

1924年冬，钱先生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演讲《国学

① 李学勤：《〈大家国学〉总序》，刊于《大家国学·钱基博卷》（傅宏星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分科研究的问题》时,可能已经将国学的研究范围分为了六类:“曰小学之部,曰经学之部,曰子学之部,曰史学之部,曰文学之部,曰校讎目录之部”,并称之为“国学的科别”,是为国学的六分法。他又把对国学的分科研究称为“国学平面的解剖”^①(即李学勤先生所谓“横的分类介绍”),认为分科研究可以辨章学术,“诏学者以知方”。1931年5月,钱先生出版《国学文选类纂》一书时,即完全遵循六分法来进行分类编纂的^②。

钱先生不仅重视国学的分科研究,而且对国学的历代演变也很关注。1925年2月,他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演讲《国学历代变异的问题》,已经把国学分做西周之学、东周之学、汉学、魏晋之学、唐学、宋学、清学七种,并称之为“国学的代殊”,而又把对“国学的时代性”的考察称为“国学纵断的视察”^③(即李学勤先生所谓“纵的历史叙述”);是为国学的“七期”。我以为,仅从钱先生将“西周之学”单列为一项,不随波逐流而抹杀儒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奠基地位,无疑是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国学史观,足见其国学思想的原创性和深刻性。

钱先生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特殊产生的国学,但

① 钱基博:《国学历代变异的问题》,刊于《南通报·文艺附刊》,1925年2月17日—3月1日。

② 钱先生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四月出版《国学必读》一书,是按照通论、经学、小学、史学、子学、文学六部分来进行分类编选的。类目虽有小异,但所以分类者则同。

③ 钱基博:《国学历代变异的问题》,刊于《南通报·文艺附刊》,1925年2月17日—3月1日。

也不是代代都能够产生出一种特殊的国学。

讲到国学的起源，他认为不得不谈到两部古书：一部是《禹贡》。纪山川，明土壤，辨贡赋；总算是四千年前世界最古的一部人文地理学。一部是《洪范》。虽是箕子所述，然称“传自神禹”，自然是神禹有著作权的；这部书说明天人相与的道理；这可算是世界最古的一部人生哲学。

所谓西周之学，就是文王、周公之学。在钱先生看来：西周之学，只是根据现实人生的社会，说明两个观念：一个是“礼”，一个是“易”。古人见到社会是有条不紊，所以说“礼者天地之序也”；感觉到社会的现象是变动不居，就说“天下之动”，“刚柔相推而生变化”。钱先生又引西哲康德的社会学理论，来分析西周之学。认为研究社会静态的社会静学，便是三部礼书——《周礼》、《仪礼》、《礼记》。而研究社会动态的社会动学，就是“见天下之动”的一部《周易》。此外除《乐经》放失不可考；再有《尚书》、《诗经》、《春秋》，这三部书，只算是“天下之动”的一个记录。话虽然这样说。不过康德讲社会的动态，是一种进化的观念，西周之学的《易》，却是认定“无泰不否，剥复循环”讲。就是认定《周易》的一个“周”字——周而复始讲去。这是“西周之学”的一个大要。

东周之学，只是西周之学的分裂。《庄子·天下篇》就是说明这种分裂的趋势。诸子之学，从此而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儒、墨、阴阳、名、法、道德六家。其中孔子是西周之学的一个整理者；老子是西周之学的一个破坏者。努力破坏的结果，就造成西周之学的分裂而为东周之学。

到了秦始皇一统天下，听了丞相李斯的话：“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

弃市。”从此西周之学和东周之学，同付一炬！所以汉学不过从灰烬中间，将西周之学，掇拾起来，下一番补订功夫。由于五经本子来源不同，汉学就分了今文、古文两派。西汉儒者，本信今文。到了东汉，古文占了最后的胜利。

汉学碎义逃难。到了魏晋时候，老庄之学，又渐渐兴盛起来了！换句话说：魏晋之学，就是西周之学的衰歇而东周之学的重兴。那时，佛法从西方输入，非相非法，谈空遣有；正和魏晋学者祖述老庄，忘形自得，超乎象外的脾胃适合。所以梁释僧佑辑《弘明集》，其中所载的文，就多取佛法和老庄相引证。这是国学第一次的门户开放，结果成就了国学的印度化。

唐学虽没有多大的发明；然而继往开来，也尽有值得特笔的地方。据《唐书》称：唐太宗因为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这就是现在称做《十三经注疏》的底本。那时，一方面既注意整理西周之国学，一方面又尽量输入印度之佛学。贞观三年，玄奘三藏求法西行，只身遍历五印度，尽礼戒智诸论师；受法而归，在长安开了个译坛。佛学之大乘一派，从此就在中国兴盛起来了。

宋学也叫做“理学”。因为宋儒不喜欢和汉儒一样，做琐碎的考证功夫，专从“形而上”方面，探求宇宙和人生的原理，所以叫做“理学”。这个“理学”，实在是“印度之佛学”和“西周之学”妙合而凝，孕育的一个胎儿。中间又分朱、陆两派：朱熹上承程颐，还要“道问学”，尚带些汉学的色彩。陆九渊下开王守仁，便只“尊德性”，佛学的色彩愈来得浓了。不过宋儒只承认“理学”是文武周孔一脉传下来的西周之学，不承

认有佛学的成分掺在中间。这也可见我们中国学者一种故步自封、阳儒阴释的习气。其实这一回国学的印度化，好像替国学辟了一个新领域；宋儒的功绩着实不少。南宋以后，朱学极盛。到了明朝，出了一个王守仁；陆王之学，渐渐压倒程朱了。所谓朱陆之分，从此成了学界一个大问题。

讲到清学，钱先生指出它实在是数千年来国学的一种逆流运动；也可称做“国学第二次的还原”。因为从明朝一班遗老，像孙奇逢、李二曲、黄宗羲讲陆王之学，一转而为康熙间陆陇其、李光地、张伯行一班人出来讲程朱之学，又一转而为乾嘉间惠栋、戴震一班人出来讲东汉古文之学；到嘉道间，庄方耕、刘申受、龚自珍、魏源一班人出来，索性主张西汉今文家言；连东汉之学，都不屑讲。从此久被东汉古文之学剋灭的西汉今文之学，重新死灰复燃，站了起来，和东汉古文之学，作一种对抗。一直到民国，当时国学界有两个重镇：像章太炎先生，就是古文家的“都头”；梁任公先生，便是今文学的“后劲”。所以汉学——尤其是东汉之学，实在是占据了清学的一个中坚。不过清儒讲汉学，究竟和汉儒不同。

汉儒讲学，最谨守师法家法；先师传授下来的学问，弟子一个字不敢改易。而清儒却不主张墨守。不惟弟子对于先生，时时加以纠正；就是汉唐的旧注旧疏，也要驳难；甚至经文，也有勇气去改。这种精神，实在是宋儒一种“求是”的精神。不过宋儒虽然想要“求是”，然而没有考据的工夫，不免武断。到了清儒，就实事求是，把宋儒求是的精神，运用于汉儒考据的方法之中。他们治学的成绩，就远胜宋儒。所以人说“清儒治汉学”，这句话太笼统。只好说“清儒是用汉儒的考据功夫来治学”。若论他们“求是”的精神，几乎像极宋朝

的学者,不信传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已,遂至改经删经一样,虽然不学宋儒的武断,然而比之汉儒牢守着师法家法,终是不同。这一点,或许也是当时一班宣讲清学者没有注意到的。然而钱先生这番话,也不是说清儒个个如此;只限于戴震一派。惠栋讲古文学,就不免墨守。嘉道以后一班人讲今文学,又嫌穿凿附会。

钱先生还认为,上述七种“特殊产生的国学”,并不是每一期都具备永恒的学术价值(即钱先生所谓“国学的历史性”)。他尤其反对时人一谈国学,总说汉学宋学,往往言不及义。他说:“然而如果真正就国学的历史性而论:只有西周之学,东周之学,和宋学三种。汉学不过抱残守缺,把西周之学,掇拾整理一番罢了,并没有多大的历史性;倒不如宋学能把西周之学,和印度之学接合起来,成功一代特殊的国学。”^①观点鲜明,让人耳目一新。

钱基博先生以七期来划分中国传统学术思潮,即西周之学、东周之学、汉学、魏晋之学、唐学、宋学、清学,虽偏于静态的分析,但会异见同,条其流别,同样是其国学思想的一条主线。不过,他对国学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深化和调整的过程。比如在《国学文选类纂》总叙中,钱先生就主动放弃了“西周之学”和“东周之学”的叙述模式,而引进了“人文主义”、“古典主义”两个概念,以义数之辨(对应人文主义与古典主义)来分析、归纳和评价历代国学之演变,偏于动态的辨识,无疑是其国学思想成熟的标志之一。

① 钱基博:《国学历代变异的问题》,刊于《南通报·文艺附刊》,1925年2月17日—3月1日。

《国学文选类纂》有甲集、乙集、丙集三部，所选文章分论小学、经学、诸子学；每集各有叙目，叙文指示途辙，考镜源流，偏重“纵断的视察”；大多数选文末附考证部分，有对文字上的校勘，也有对文章的解释、论述和阐发。但从《总叙》和内容编排来看，该书似乎应分为上、下两册，下册有丁集、戊集、己集三部，所选文章分论史学、文学、校讎目录学，但不知什么原因，目前仅见一册（即上册）出版，无疑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国学文选类纂》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五月正式出版，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四月再版，是商务印书馆一再重印的学术类图书之一。该书体例完备，选目精审，考证详实，见解卓越，其影响力和本身的价值自不待言。可能由于文言写作的原因，自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四月至今，大陆没有重印此书，港台也未见再版本、盗版本。然值此“国学热”之今日，该书的重新出版，我以为恰逢其时，可以起到正本清源、旧籍重光的作用。此次重印《国学文选类纂》，乃以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四月再版本为底本。点校时，鉴于民国时期著述通例，除了文字上化繁为简之外，只对小部分标点做了改动，至于句中明显的错、讹、衍、脱等文字，则直接删改或补正，并用脚注予以简要说明；而书中引文非不通处，概不订正，以见原貌。惟个人能力有限，点校错误在所难免，尚希读者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庚寅春日后学傅宏星谨识

目次

总叙	1
----------	---

甲集 (小学之部)

许慎《说文解字叙》	25
朱筠《重刻许氏〈说文解字〉叙》	49
江声《六书说》	57
章炳麟《小学略说》	63
章炳麟《理惑论》	67
姚华《说文古籀补补序》	71
杨荫杭《埃及文与华文同源说》	73

乙集 (经学之部)

龚自珍《六经正名》	85
章学诚《经解》	97
魏源《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序》	101
江藩《南北朝经术流派论》	113
赵坦《唐孔颖达〈五经义疏〉得失论》	123
胡培翬《诂经文钞序》	127
陈寿祺《经郭条例》	131
蒙文通《议蜀学》	139

丙集 (子学之部)

《庄子·天下篇》	153
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	163
刘孚京《诸子论甲》(儒家)	173
陈三立《读荀子》	177

刘孚京《诸子论乙》(道家)	185
陈三立《老子注序》	191
章炳麟《庄子〈齐物论〉释序》	195
陈三立《读列子》	197
谢无量《韩非叙略》	201
孙诒让《墨子间诂序》	207
戴望《汪仲伊〈握奇图解〉序》	217
姚鼐《读〈司马法〉〈六韬〉〈孙子〉》	219
汪中《吕氏春秋序》	223
梅曾亮《淮南子书后》	225

总叙

《国学文选类纂》之辑录既毕，意有未申，于是濡毫吮墨以发其指曰：

《记》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仲尼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博文质无底，奚所能为役！独念博学通人，希圣有作，亦有辨章学术，条析流派，以示途辙，牖方来。谨以诵览所及，写著其文，以当明述，辑为六类：曰小学之部，曰经学之部，曰子学之部，曰史学之部，曰文学之部，曰校讎目录之部，而题其端曰《国学文选类纂》。将以宏阐国学，考镜源流，统斯文之条贯，诏学者以知方；庶几国学之筌枢，文章之林圃也！倘有睹记旁逮，足备考论，见仁见知，义各有当，附之于篇，为后学治国闻者览观焉。然而鄙怀之所欲陈，则固别有所在。倘挟册而以为窥国学之宏秘焉，博愿有以进之也。诚窃以为必先知“学”之涵义，而后可与国学。试条析而竟其义：

一、何谓“学”？按“学”之为言“觉”也；（《说文·教部》：“敦，觉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白^①声。学，篆文敦省。”《白虎通·辟雍篇》：“学之为言觉也。”）“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民之初载，其矇未知；譬如宝在乎玄室，有所求而不见；白日昭焉，群物斯辩矣；学者，心之白日也。今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风而炎炽，如水赴下而流速，斯大圣之学乎神明而发乎物类也。”（采徐幹《中论·治学篇》）“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见

① 白，原作白，今据《说文解字》改正。

《荀子·劝学篇》》惟“觉”斯征“学”，惟“学”乃臻“觉”。是故言“学”者不可不知“义”与“数”之辩；知之者觉，昧之者愚也！何以言其然？《荀子·劝学篇》曰：“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古人言学以圣为归。圣者，大觉至通之称。《庄子·天运篇》曰：“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说文·耳部》：“圣，通也。”《白虎通·圣人篇》：“圣者，通也。”）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此知“义”与“数”之辩者也。《汉书·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此不知“义”与“数”之辩者也。於戏！让清乾嘉已还，学者方承惠栋、戴震诸老之遗风，袭为一种考据琐碎之学，辩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号曰汉学；群流和附，坚不可易；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若舍是不足与于“学”者！庸詎知汉学之所谓名物、制度、训诂、书数者，徒荀子之所谓“学数有终”，而无当于“不可须臾舍”之“义”也乎？古人为学以畜德，贯其义也。后儒讲学以驰说，逐于数也。虽然，荀子不云乎：“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见《荀子·劝学篇》）此“觉”与“不觉”

之别，“君子”、“小人”之分也！不可不深察！不可不熟虑！

二、何谓国学？国学之一名词，质言其义曰：“国性之自觉”云尔！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而人心风俗之所系，尤必先立乎其大，深造而自有得，相以维持于不敝。其取之它国者，譬之雨露之溉，土肥之壅，苟匪发荣滋长之自有具，安见不求自得而外铄我者之必以致隆治，扬国华也耶！是故国学之所为待振于今日，为能发国性之自觉，而俾吾人以毋自暴也！吾生四十年，遭逢时会，学术亦几变矣！方予小弱，士大夫好谈古谊，足己自封；其梯航重译通者，胥以夷狄遇之；而诮然自居为中国；以用夷变夏为大戒！于外事壹不屑措意，此一时也。“风气渐通，士知舛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詵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谭，不咨其是。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采严复《天演论序》）此又一时也。既世变日亟，国人晓然于积弱，则又以为中国事事不如人，旧学寔以放废！于是“家肄右行之书，人诮专门之选，新词怪谊，柴口耳而滥简编；向所谓圣经贤传，纯粹精深，与夫通人硕德，穷精敝神所仅得而幸有者，盖束阁而为鼠蠹之久居矣！”（采严复《涵芬楼古今文钞序》）然而行之二十年，厥效可指：衡政，则民治以为揭帜，而议士弄法不轨，武人为于大君！论教，则欧化袭其貌似，而上庠驰说不根，问学徒恣横议！放僻邪侈，纪纲无存！欲求片词只义，足以维系一国之心人者而渺不可得！国且不国，何有于治！於戏！古谚有之曰：“橘逾淮化为枳也。”况于谋人之国，敷政播教；将谓树一国之人文，而可以移植收其全功者乎！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其效则既可睹矣！此又一时也！大抵自予之稚以逮今日，睹

记所及，其民情可得而言：其始足己而自多！后乃蔑己以徇人！然见异思迁者，徒见人之有可法，而不知国性之有不可蔑！而足己自多者，又昧人之有可法，而不知国性之有不尽适！二者之为蔽不同，而失之国性之不自觉则均！是故言“国性之自觉”者，必涵二谛而义乃全：一曰“必自觉国性之有不可蔑”。昔罗马大哲尝作诗歌以大诰于国曰：“前车非远，希腊所程猗！希腊之花，昔何荣猗！彼昏不知，狎侮老成猗！黷其明神，薄其典型猗！万目异色，群耳无正声猗！纲绝纽解，人私自营猗！累世之业，斲其沉冥猗！嗟我国人，能勿惩猗！”（采梁启超译。见《庸言报》第一卷第一号《国性篇》）嗟乎！吾每诵此，而感不绝于予心也！傥一国之人，自上下下，不复自知我国历史久长之难能，文化发扬之可贵；本实已拨，人奋其知，自图私便；则国与民之所恃以转系于不坏散者，仅法律权力之有强制，生命财产之受保障耳！于精神意志之契合何有！一旦敌国外患之强有力者临之；但使法律权力，足以相制；生命财产，足以相保；而蚩蚩者氓，只如驯羊叩狗，群帖焉趋伏于敌人之足下已耳！古今之亡国者，未或不由是也！傥有国之人焉，胚胎于前光，歌颂其历史，涵濡其文化，浹肌沦髓，深入人人。人心不同，而同于爱国；如物理学之摄力，转挽一国之人，而不致有分崩离析之事也！如化学之化合力，熔冶国人，使自为一体，而示异于其它也！然后退之足以自固壁垒，一乃心，齐乃力，外御其侮；而进焉则发挥光大之以被于全人类而为邦家之光！此国性自觉之第一义也。一曰“必自觉国性之有不尽适”。吾国立国于大地者五千年，其与我并建之国代谢以尽者几何！而我乃如鲁灵光巍然独存！虽中间或被夷虏，为国大厉；而渐仆渐起，不旋踵而匡复